

兼收並蓄：

# 唐代金銀器中的外來影響

／譚前學

開放的政治環境和「絲綢之路」的空前暢通，造就了唐代對外交流的繁榮。唐王朝既能以自身之強而散發出如日中天的強大輻射力，又因自身發展需要而產生了海納百川的巨大包容量。在中國歷史上，唐王朝以博大寬厚的氣度與謙虛誠懇的心態同世界各國所進行的經濟文化交流，其規模、層次和力度都堪稱中國古代之最，大唐文化也因此而顯示出強烈的世界性。對此，唐代的金銀器表現得尤為明顯。不但金銀器的大量使用是受到西方習俗影響的結果，而且，由於大量吸收了粟特、波斯薩珊等西亞和中亞金銀器發達地區的工藝、造型

和紋飾，還使唐代的金銀器呈現出了濃郁的異域色彩與前所未有的多樣性。當時既有直接傳自域外的產品，也有真偽難辨的仿製品，但更多的則是造型與紋飾方面中西合璧的產品。如狩獵紋高足銀盃的造型源於東羅馬，但杯身的狩獵紋裝飾圖案卻是中國風格的，仕女狩獵紋八瓣銀盃的造型體現出典型的粟特金銀器特徵，仕女遊樂與狩獵裝飾圖案卻是典型的唐代本土題材。相反，摩揭紋金杯的造型雖是中國式的，但內底中心的摩揭紋卻是印度文化影響的產物，在摩揭周圍裝飾的聯珠紋又具有西亞金銀器的特點。

唐代雖然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但由於中西方在政治、宗教、藝術以及生活習俗上的差異，唐朝在接受西方器物及其影響的同時，也開始了創新，使器物的造型、紋樣變得更適合中國人的使用和欣賞習慣。大致說來，八世紀中葉以前的唐代金銀器明顯受到中亞、西亞等地金銀器的影響，具有強烈的異域色彩。八世紀中葉以後，逐漸擺脫了外來文化的直接影響，完成了金銀器的中國化進程。

## 一、唐代金銀器中的外來工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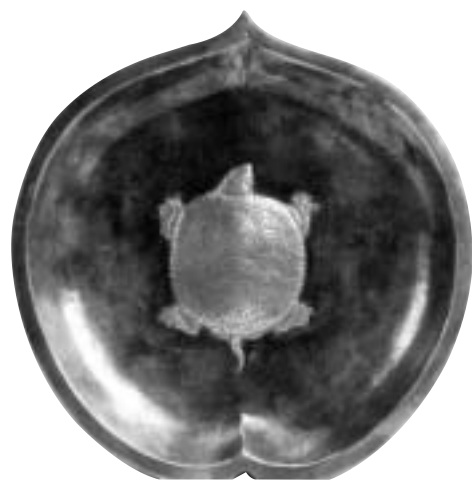
早在戰國、西漢時期，西方的金銀器及製造工藝就開始傳入中國，至南北朝時期，人們在對外來金銀器製作技術和裝飾工藝進行更多模仿和學習的同時，也試圖將它們與中國傳統的器型加以融合。唐代由於對外交流更為廣泛，西方金銀器物的捶揲工藝、造型藝術和裝飾紋樣在大量傳入的同時也逐漸與唐代的創新融為一體，使中國古代金銀器風格突變，並在外來工藝中，對中國金銀器影響最大的是捶揲工藝。捶揲工藝最早出現

在西元前兩千多年的西亞、中東地區並大量用於金銀器的成型製作。由於中國古代金銀工藝長期受制於青銅鑄造工藝，中國傳統金銀工藝也以鑄造成型為主。雖然考古資料顯示，我國在東周時期的金銀加工技術中就已出現了捶揲技術，但此種技術一直未見廣泛用於器皿成型製作。隨著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規模展開，西亞、中亞等地的商人、工匠紛紛來華，他們在帶來大量國外產品的同時，也帶來了包括金銀器製造在內的不少工藝技術。由於金銀均具有較好的延展性，捶揲成型更能體現金銀製品的特質和美感，因此，這種技術一旦傳入，便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絕大部分都是捶揲成型，足見其影響之大。

另外，薩珊波斯金銀器常用的凸紋裝飾工藝也對唐代早期的金銀器裝飾工藝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凸紋裝飾技術，屬於捶揲工藝，又稱為模沖，即在金銀器物的表面，以事先預製好的模具衝壓出凸起的花紋圖案。其特點是，主體紋飾突出，立體感強，具有極強的裝飾效果。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



圖一 唐 舞馬銜杯皮囊式銀壺 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二 唐 鑲金龜紋桃形銀盤 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一)、鑲金龜紋桃形銀盤和鑲金雙狐雙桃形銀盤(圖二)就是用這種裝飾技法製作出的精品。可以說，正是捶揲技術的輸入與廣泛運用，使中國古代的金銀器製造工藝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並極大促進了唐代金銀器製造業的繁榮。

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中，有些碗底或鐳底還焊有浮雕式的裝飾圓片，使器物形成雙層底(圖三)。這種

## 二、唐代金銀器中的外來造型

在器型方面，唐代金銀器中的外來影響也是相當明顯的。過去大多籠統地說受到西方的影響。在具體到某

一器物時則多認為主要是受波斯薩珊器物的影響。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更多地認可，唐代金銀器上的外來影響除波斯薩珊外，還應當包括中亞粟特以及羅馬拜占庭等地的文化因素。

粟特地區位於東西交流樞紐的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粟特人善於經商，其經商足跡遍及歐亞內陸，他們在充當國際貿易轉運者的同時也是東西方文化的傳播者。唐朝與粟特保持著密切的往來關係，唐朝與西方之間的各種經濟文化交流，許多都是

通過粟特人進行的。粟特人不但善於經商，而且其金銀器的使用和製作都極為發達，對唐代金銀器的影響也最大。

唐代金銀器中有為數不少的各種帶把杯。帶把杯不見於中國傳統器形中，其造型當源自粟特地區。出土的唐代帶把杯，一部分係直接從粟特輸入，另一部分是仿粟特器物製造的。西安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韓森寨出土的金銀帶把杯，把手呈圓環形，上部有寬寬的指墊，頂面刻胡人頭像，把手的下部多帶有指墊，有些器體還呈八棱形，是典型的仿粟特器物(圖三)。當然，唐人也並不是一味模仿，在模仿中時有創新。如有的帶把取消了指墊和指墊，或把指墊變成葉狀，杯體也由八棱折腹變為碗形、花瓣形，這些都是唐代的創新(圖四)。尤其是有不少器物，造型雖取自粟特器型，紋樣卻是典型的唐代本土特點，驟視之恰如外國器皿，細審之卻又純粹是中國風味，即所謂的中西合璧。

高足杯也不見於中國傳統器型。它最早出現於羅馬時代，拜占庭時代沿用。羅馬—拜占庭式的高足杯在唐



圖三 唐 八棱樂伎金盃 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四 唐 金框實鈿團花紋金盃 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五 唐 狩獵紋高足銀杯  
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代以前就已傳入中國。唐代金銀器中的大量高足杯很可能是受拜占庭器物形制的影響而製作的。由於，薩珊控制著中國通往拜占庭的交通要道，拜占庭器物對唐代金銀器的影響也有可能間接的。高足杯這種西方特徵的器物傳入中國以後，唐代工匠並未直接地全部仿造，最為明顯的是器物的裝飾紋樣。唐代高足杯上的紋樣主要是纏枝花草、狩獵和各種動物紋，都是常見於其他種類器物上並為當時人們所習慣和喜愛的紋樣（圖五）。



圖六 唐 摩鵝紋金長盃  
一九八三年西安市太乙路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對唐代金銀器影響最大的另一個地區是薩珊。薩珊是三—七世紀波斯帝國的一個王朝，其疆域從幼發拉底河一直延伸到興都庫什山脈。其金銀工藝舉世聞名。西元六五一年，薩珊被阿拉伯人滅國後，其王子卑路斯和大量波斯人流亡到中國，再加上此前唐王朝曾與薩珊王朝頻繁通使，其發達的金銀器製造技術很自然就傳到了中國並影響了唐代金銀器的製造。唐代金銀器中的金銀長杯就是對薩珊式



圖七 唐 立鳥紋銀盒 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銀器的模仿和改造（圖六）。多曲長杯原本是典型的波斯薩珊式的器物，口沿和器身呈變化的曲線，宛如一朵開放的花朵，唐朝人對這種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愛。但是，薩珊式多曲長杯內部有突出的稜線，與中國器物光滑的內部不同，使用功能不符合中國人的習慣。優美的形態和使用上的缺陷成爲實用與觀賞之間的矛盾。爲此，唐代工匠加高器足和器身，淡化內壁突起的稜線，經過不斷的改進和調整，中晚唐時期的多曲長杯，表現出了全然不同於薩珊式長杯的面貌，並最終成爲唐代的創新作品。

器物的形制和使用方式與生活習俗密切相關，在一個地區流行的器物到另一個地區往往就失去了它的使用價值。因此，唐代的外來金銀器皿在中國的實用價值並不大，多是作爲奇珍異物收藏賞玩。那些仿粟特的帶把杯、仿拜占庭的高足杯和仿薩珊的長杯雖然出現一時，卻並沒有廣泛流行。但是通過模仿，工匠掌握了西方金銀器製作的主要工藝，使得唐代金銀器的總體風格爲之一變，一些不見於中國傳統的新器物也紛紛出現。唐代金銀器中的輸入品、仿製品和創新

品的演變過程，正是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揚棄及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過程。

### 三、唐代金銀器中的外來紋樣

除了工藝和器型，唐代金銀器上的紋飾也反映出外來文化的影響。越是早期的器物，所受到的影響也越



圖八 唐 翼鹿紋銀盒 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大。來自域外的紋樣主要有：

**立鳥紋：**頸有綬帶的立鳥紋常見於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器上。唐代金銀器上的鳥銜花草、綬帶或方勝紋樣顯然受到了薩珊金銀器的影響。不過，唐代的立鳥紋大多姿勢優美，體態生動，尤其是後來，它們以中國人喜愛的成雙配對的形式出現，並增添了飛騰的動感（圖七）。而薩珊的立鳥呆板，多側身像，身體僵直，皆單個出現。

**翼獸紋：**唐代早期的銀盒中，有的頂部和底部的中心均飾帶翼的獅、

**聯珠紋：**在唐代前期金銀器上極為多見，主要來自波斯薩珊和粟特藝術。

**摩羯紋：**摩羯是印度神話中一種長鼻利齒、魚身魚尾的神異動物，被尊奉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常見於古代印度的雕塑和繪畫藝術中。東晉時期，隨著佛經的漢譯，摩羯被介紹到中國。到了唐代，它成了金銀器中較為常見的裝飾圖案。由於阿富汗的伯格拉姆遺址出土的貴霜時代遺物和中亞薩馬爾罕片治肯特粟特人遺址中，也有摩羯紋樣，所以摩羯紋有可能是從中亞間接傳入的。

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也只有雙向的交流才是正常的交流。對於唐代金銀器來說，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是主要的，而影響則是相互的。在金銀器上，西方國家和地區也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唐代的文化因素。比如唐代的纏枝卷草紋、雲氣紋和魚子紋為地等紋飾工藝就為粟特銀器所取法。中亞西亞傳統的銀器只有圓形口的，後來也出現有分曲花瓣口形制，這明顯是中國影響的結果。此外，唐都長安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日本奈良的平城京是絲路東端的延伸點，包

鹿等，周圍繞以麥穗紋圓框。薩珊和粟特器物上的動物多為想像出來的形象，將各種動物添加雙翼，並在四周加麥穗紋圓框。這種裝飾方法在薩珊銀器上更為常見，稱為「徽章式紋樣」，中國古代神話和紋樣中，也有翼獸，但它們似乎與魏晉隋唐時期流行起來的翼獸紋沒有直接的承源關係。唐代金銀器上的這種紋樣顯然接受了薩珊藝術的內容（圖八）。當然，在接受過程中也逐漸產生了不少變化。主要是取消了圓框中的動物，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寶相花類，或寶相花與徽章式紋樣並存於一件器物上。八世紀中葉後，這種裝飾手法在唐代金銀器上消失。

**纏枝鳥獸紋：**唐代金銀器上有發達的纏枝忍冬、纏枝葡萄紋，其中穿插飛禽走獸。在西元前後的地中海、黑海地區，曾非常流行葡萄卷草間點綴禽獸的紋樣。纏枝鳥獸紋很有可能是在中國傳統雲氣紋樣的基礎上糅合了外來紋樣的特質而形成的。也有人認為，纏枝紋伴隨著佛教藝術出現在中國，早在南北朝時就已十分成熟而流行，唐代金銀器上的這種紋樣應是南北朝風格的發展延續。

括金銀器藝術在內的大唐文化曾被東亞地區全面吸收和仿效。只不過東亞地區的金銀器種類遠不如唐朝那樣豐富，紋飾也不如唐代的華美規範，而稍顯簡易笨拙。

金銀器製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藝術創作，體現了人們的思想和觀念。唐代金銀器大量吸收外來工藝、造型和紋樣並由此形成耳目一新的獨特風格，說明外來文化影響的真實活力在於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給人以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當人們不再滿足傳統和現實時，外來事物的影響就越發加大，藝術觀賞情趣也發生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唐代金銀器中的仿製品和創新品是否被人們接受或能否流傳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們對外來文化所持有的寬容心態以及外來文化啓迪、引發了人們放棄了對許多傳統的恪守，逐漸改變了自己某些固有的觀念和生活，創造出了新的文化。如果僅從工藝或技術的層面來認識唐代金銀器中的外來影響，那麼就失去唐代金銀器研究的特別意義。

